

論蘇聯「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共黨角色

趙春山

壹導論

壹、導論

貳、「已發展社會主義」的意義

一、「已發展社會主義」概念的形成和特徵

二、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全民國家」

參、蘇聯共產黨的角色

一、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到「全民黨」

二、共黨在「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功能

肆、共黨與現代蘇聯社會問題

伍、結論

研究俄國歷史和蘇聯政治的學者，常常對下列三個問題感到興趣：

第一、為甚麼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俄國革命成功建立的共黨政權，到今天不但沒有像列寧（V. I. Lenin）當初預測的那樣趨於消亡，反而有日漸膨脹的現象？

在一九〇二年所寫的「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一書中，列寧提出了建立一個「職業革命家」組織的計劃。這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它的任務包括將社會主義意識帶給工人階級，以及根據這些革命家對當時沙皇社會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分析，擬具一套革命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列寧表示，由於此革命政黨必須在沙皇嚴密監視下進行非法活動，因此它的內部組織應

該屬於緊密、高度集中化，以及紀律化的整體，來從事有效的政治活動。最終目標是領導羣衆武裝推翻帝俄專制，先建立民主，再伴隨其他國家的社會革命，成立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①

雖然導致帝俄瓦解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認的，列寧建立的職業革命家組織，以及他策劃的革命戰略，是戰勝其所有政敵的主要因素。對此，芬索德（Merle Fainsod）有這樣地敘述：「布爾什維克的敵人雖然很多，但他們都是衰弱，組織不良，分裂以及冷漠的一羣。列寧的戰略即是刻意要強調他們的分歧，中和他們的反對聲浪，以及利用他們的冷漠感。」^②

十月革命的勝利，顯示列寧的目標是達到了。但他在「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書中對於蘇聯國家發展的預測，却沒有實現。在列寧的心目中，國家「是特別的權力組織，是為了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強力組織。」^③而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消滅這個帶有鎮壓性質的組織。雖然列寧強調，革命成功後，在一段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中，國家仍將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而繼續存在。但理論上，他也是個「國家消亡論者」。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曾如此表示：

「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制度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④

六十多年的政治發展經驗顯示，列寧和其他共黨理論家的看法太過樂觀了，蘇聯共黨時至今日仍控制着一個強有力的官僚國家，它似乎沒有任何走向自行消亡的跡象。

第二、史達林（Josef V. Stalin）死後，有關蘇聯政治體系的問題，曾在西方政治學界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和爭辯。例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是不是代表蘇聯政府的一個固定形態？能否將極權主義視為由落後社會快速步入現代化之間的過渡體制？一旦國家獲得現代化的成果，極權主義體系是否能夠演變為開放的社會？

毫無疑問地，以「極權主義模式」來研究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長久以來會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富萊德瑞赫（Carl J.

^① M. Lewin, "The Communist Party, Yesterday and Today," in R. W. Davies, ed.,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 1978), pp. 66-67. 另參「啟智書」全文內容試V.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②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86. 有關俄國革命與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參見 Arthur E. Adams,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Bolshevik Victory: Causes and Process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2).

^③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一九四九年），頁一八〇。

^④ 同上，頁一七五。

Friedrich 和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K. Brzezinski) 即為這一概念，擬訂了六項制度性的特徵，作為分析的標準，其中包括：一個權威的意識形態；由一個獨裁者領導的單一政黨；恐怖警察控制；大眾傳播工具的近乎完全獨佔；戰鬪武器的近乎完全受到控制；中央指導經濟。⑤ 簡單地說，所謂極權主義的政治體系，也就是一個「似乎能完全控制整個社會和民衆，並在相當程度下，達成此目標的體系。」⑥ 採取此一研究途徑的學者，並不認為它的運用僅限於史達林時期，或是納粹德國。他們承認今天的蘇聯，在許多方面，已不同於史達林統治下的情況，但却強調：「未來的形態，無論是它要求的限度或是表現的潛力，都已包含於過去的形態中。史達林長久統治加諸於蘇聯社會的一套東西，仍對蘇聯具有影響。」⑦

以極權主義模式解釋史達林死後的蘇聯政治發展，遭到了一些蘇聯政治研究學者的挑戰。他們認為在史達林死後，意識形態已不再那麼僵化，對於領袖個人的「完全性」 (perfectability) 已不再持樂觀態度；新的獨裁者也不像史達林那樣，能完全支配他的部屬，共黨更具有羣衆的特點；秘密警察的角色大受限制，而民衆因不再擔心無緣無故會遭到逮捕，使專斷的恐怖消失無形；中央控制的傳播工具，對於打破傳統的新觀念更為開放，鐵幕的部分打開，使民衆有機會接受更多的新知。最重要的是，整個政策過程的開放，可以容納廣泛的不同政策考慮，以及更加努力達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策目標。⑧

極權主義模式受到的批評，主要來自那些採用「利益團體研究途徑」 (interest group approach) 的學者，其中以史吉林 (Gordon Skilling) 教授最為著名。這些學者從研究西方政治體系的多元主義特點出發，認為蘇聯政治體系之中也有利益團體活動的潛力，以及具有多元化的傾向，他們相信，官僚衝突已成為蘇聯政策過程的中心，而利益團體在其扮演某種角色。因此，這些學者強調，雖然政治領袖個人有時可能運用政策議題從事權力競爭，但各種政策的辯論確實存在着，而若干特殊團體也確實影響了決策過程。這些西方學者感到興趣的政治團體是所謂的「官僚團體」 (bureaucratic groups)。他們認為，蘇聯的這種團體的領袖，已在黨、政府、軍隊或警察機構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們利用這些機構作為權力來源，並且採取反映其機構特殊利益的立場。⑨

⑤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9-10.

⑥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19.

⑦ Fainsod, *op. cit.*, p. 577.

⑧ Hough and Fainsod, *op. cit.*, p. 522.

⑨ 有關「蘇聯體制研究途徑」學術對蘇聯政治研究的觀點，詳見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此涉及兩方面研究方法的辯論，即 Symposium edited by John A. Armstrong,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munist Systems," *Slavic Review*, 26 (March 1967), pp. 1-28.

利益團體研究途徑的學者，批評極權主義模式排除利益團體在蘇聯政治體系中發揮的功能，同時忽略了政策過程的因素。但這些學者也受到那些為極權主義模式辯護的學者的挑戰。例如，歐東（William E. Odom）即如此表示：「極權主義模式最具有說服力的主張，即是試圖從局外去思想蘇聯政治的研究。我們從現代蘇聯政治距離極權主義模式有多遠這個角度去了解，比透過新的模式去了解，會認識得更多。」^⑩

從上述兩種研究蘇聯政治途徑的主張看，究竟我們應該採取何種途徑，才能對史達林死後的蘇聯政治發展，作較為深入的觀察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三、蘇聯共黨能否面對蘇聯現代化過程中帶來的一些挑戰？換言之，共黨能否避免現代化出現的若干特徵和共黨特權地位兩者間爆發的衝突？

對於這個問題，西方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像費斯契爾（George Fischer）等學者，認為共黨會成功地應付挑戰。他認為這個新的「雙重行政部門」（dual executives）可以透過其技術和政治技巧來促進權威的合理化。而這些技巧也可使它們有效地組織蘇聯社會；其他的學者則認為，由於蘇聯必須探尋新的結構來配合二十世紀末期的需要，故共黨的權威勢將趨於腐蝕，這些學者強調，蘇聯今後的演進方向，將朝向類似西歐多元政治概念下的形式；另外一派學者則持第三種觀點，認為蘇聯體系太過僵化而缺乏適應能力。因此，在不久的將來會爆發一場武裝動亂。這派學者指出，馬克思很久以前就已表示：統治階級從未自願放棄權力。^⑪

上述三個問題，彼此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本文假定，如果我們能對蘇聯「已發展社會主義」（developed socialist society）概念，以及蘇聯共黨居中扮演的角色作充分的了解，則這些問題就不致於構成我們研究蘇聯的障礙。

貳、「已發展社會主義」的意義

一、「已發展社會主義」概念的形成和特徵

根據一九七七年頒布的蘇聯現行憲法，「一個已發展之社會主義社會，業已在蘇聯建立。」^⑫蘇聯政治學者柏拉茨基（

⑩ William E. Odo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1976), p. 367.

⑪ Stanley Rothman and George W. Breslauer, *Soviet Politics & Society*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1978), p. 183.

⑫ "Th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1977, quoted in David Lane, *Politics & Society in the USS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appendix c/2, p. 553.

② William E. Odo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1976), p. 367.

③ Stanley Rothman and George W. Breslauer, *Soviet Politics & Society*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1978), p. 183.

④ "Th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1977, quoted in David Lane, *Politics & Society in the USS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appendix c/2, p. 553.

Fyodor Burlatsky) 認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具有若干不同的階段、時期和程度。十月革命以後，官方文件談的是工人階級之掌握政治權力；一九三〇年代顯示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基已經建立；一九五〇年代代表社會主義建設的完成；一九七〇年代則目睹一個已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建設共產主義的物資和技術基礎。^⑤

「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屬於什麼階段？我們無法從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理論中，獲得明確的啓示；但現代蘇聯理論家，似乎提供我們若干思考的線索。柏拉茨基即明白指出：

「已發展社會主義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獨立，而相當冗長的階段。在此階段中，社會主義固有的變動仍將發生，而科技革命的促進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交互糾結。蘇聯社會正步入科技革命的時期，爲了使社會生活各方面在此革命的基礎上發展，一個較長的時期，是有其必要的。」^⑥

柏拉茨基認爲「已發展社會主義」的觀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因爲它「對現階段蘇聯社會在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智能上的發展，作了深入而普遍地描述。」^⑦

實際的情況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言，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就應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時期。那麼，所謂「已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和過渡到共產主義之前的其他階段的社會，有何不同之處呢？在此，我們先比較一下史達林、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和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統治下，對蘇聯社會特質的不同認知。

史達林統治時期的特色會被歸納爲「史達林主義」（stalinism）在蘇聯社會的實施。^⑧畢亞勤（Seweryn Biaer）認爲，「史達林主義」在蘇聯歷史上，歷經三個階段的演變，史達林在每個階段都扮演了關鍵性的不同角色。第一個階段是屬於一九二〇年代的「新經濟政策」（NEP）時期，包括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鞏固，主要政治、經濟和行政機構的形成，制定長程政策和實施政策的方法。史達林這個時候是一名政客，致力於黨內的奪權，並使本身的觀點和政策合於權力鬥爭的需要，以及爲自己的前途而建立組織基礎；第二階段是由上發動革命的時期。在這段由一九二九到三八年的期間，蘇聯社會在各方面產生基本轉換。布爾什維克主義當道的這些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機構都急速地被改頭換面。史達林此時扮演的是一個革命轉換者和復興者的角色；第三個階段即所謂的「成熟的史達林主義」（mature Stalinism），在此時期，由上而下的革命已經完成，政治制度已經建立

⑤ Fyodor Burlatsky, *The Modern State and Politic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8), p. 100.

⑥ Ibid., p. 101.

⑦ 有關「史達林主義」的討論，參見 Robert C. Tucker,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7).

，長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政策都已就序。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促進體系現存關係的再造，以及增進制度的適當功能和效能。史達林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獨裁行政首長」(dictator-administrator)。^⑯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成熟的史達林主義」時期最為重要，它表現的特點有下列幾項：

- 「——大量恐怖的制度；
- 黨活動的式微；
- 大型政治性組織的缺乏固定形式；
- 一個極端機動性的經濟成長模式，而和求取軍力的目標以及因此產生的政治結果，相互結合；
- 一個異質的價值體系，此一體系有利於經濟、地位和權力的階層化，並可促進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和極端民族主義相結合；
- 不再存有改變社會的革命動力，對現存機構則堅持抱保守的維持現狀態度；
- 個人獨裁的制度。」^⑰

對於蘇聯社會而言，史達林的統治方式是十月革命以後的另一次革命。這次革命塑造的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這個社會以史達林個人獨裁為中心，環繞在他左右的是如同達林(Alexander Dallin)和布瑞斯勞(George Breslauer)所說的一個「恐怖的情境」和「普遍的焦慮氣氛」。^⑱史達林似乎相信，經由他特殊的統治方式，不需要一個共黨世界革命的外在環境，即可成功地在蘇聯從事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不可否認地，史達林確實完成了他的目標：將俄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轉變為一個工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問題是，這一「成就」使俄國民衆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特別是廣大的農民，仍處在被剝削的狀態。根據不同的估計，在實施農業集體化期間，死亡的人數即高達三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之間。^⑲

史達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的病逝，為他的繼承者留下了三個必須給與正視的，而曾被長期壓制的國內民衆的普遍「期望」

◎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10.

◎ Ibid., p. 10.

◎ Ibid., p. 11.

◎ Vernon V. Asatrian, "The Soviet Union," in Roy C. Macridis and Robert E. Ward, eds.,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Europ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8), pp. 506-507.

問題：生活水準的改善；免於恐懼的安全感；更多的自由。②

赫魯曉夫是以改革者的姿態出現的，而他的改革戰略則根據他對蘇聯社會發展的信念而來。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已從較低的社會主義，步向較高的共產主義發展階段。此一過程必會完成，而在這段期間，最重要的是提供滿足人民所需的充分必要物質。赫魯曉夫認為除非達成此一目標，否則共產主義無法實現。就赫魯曉夫而言，這個發展過程的一個中心部分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目標：即透過增加農業生產和急速改善鄉村人民生活條件，來消除城鄉差距。②

赫魯曉夫對於蘇聯社會的發展，持非常樂觀的態度，這點可以反映在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屆大會通過的「新綱領」中。這是繼一九〇三年、一九一九年後的第三次黨綱。赫魯曉夫在這次大會中首先聲稱：「社會主義已在我們的國家最後獲得全面勝利，我們業已進入全盤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③「新綱領」並且預言：「這一代蘇聯人民將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蘇聯的目標是「在今後二十年中，創造共產主義的物質和技術基礎。」根據「新綱領」的計劃，蘇聯於一九六一到七〇年期間，將在個人生產量等方面，超過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為強大和富庶的美國。每個蘇聯人民都將在物資上確保無所匱乏；在一九七一到八〇年期間，所有民衆都將擁有充分的物資和文化利益。」④

雖然赫魯曉夫確實在內政上作了一些改革措施，⑤但因成效不彰，而成爲導致他下台的一個重要因素。⑥更重要的是，赫魯曉夫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看法，也在他被黜後，成爲受人攻擊的目標。

早在一九六六年蘇共召開二十三屆大會之前，共黨理論家費多西耶夫（P.N. Fedoseev）即在「真理報」發表一篇文章，對那些企圖集中注意於共產主義社會最終目標的想法，公開加以抨擊：

「在許多方面，我們注意到在對待共產主義轉換的問題上，有一種非常急躁的情形，急於走在發展的前面，想在發展真

② Fainsod, *op. cit.*, pp. 117-118.

③ Carl A. Linzen, *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1957-1964*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p. 83-84.

④ Quoted in Ernst Kux, "Contradictions in Soviet Social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3, November-December, 1984, p. 10.

⑤ Ibid.

⑥ 除了農業改革外，赫魯曉夫在內政措施上的其他改革分別是：①放棄恐怖政策，關閉奴工營；②自一九五八年開始，以工資制代替史達林時代盛行的按件計酬，並將一些高所得的職業（如教授）降低工資；③放棄史達林剝削附庸國的經濟政策，而改變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一些性質；④對文化活動會有一段「解凍」時期。

參考李玉珍，「簡史」，蘇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一日），頁七四。

⑦ 赫魯曉夫被黜的原因參考趙春山，「蘇聯『繼承』問題之研究——論克里姆林宮的權力轉移」，東亞季刊，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一日，頁八六一八七。

正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過程中，跳越整個社會主義階段。」^②

蘇共二十三屆大會對於赫魯曉夫企圖快速完成全盤共產主義社會的想法，已明白予以捨棄。爲了填補理論上的真空，爲蘇聯現行發展階段找尋合理化的藉口，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真理報」在一篇涉及政策制定的文章中，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在一九三〇年代，並未在蘇聯獲致勝利，只是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而已；離全盤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仍有一段距離。文中並未提及需時若干才會達到「已發展社會主義」的階段。^③但根據李昂納德（Wolfgang Leonhard）的說明，這個階段，具有下列特殊傾向：

「在經濟方面：配合科技革命所需的一套新經濟制度，國民經濟的調和發展，以及生活水準的提高；

在社會方面：工人階級扮演領導角色，人民的團結，集體精神的持續，同志愛以及社會主義的時代；

在政治方面：黨對社會進行科學的領導，國家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

在意識形態方面：繼續實施馬列主義，提高一般教育水平和專業知識。」^④

布里茲涅夫一九七〇年在一篇文章中，比較具體地將「已發展社會主義」的特點，限定爲「社會制度的完整和活力，政治穩定和內部團結」，爲了實現和促進這些特色，布某認爲必須透過「黨領導角色的穩定成長」，「經濟的進一步社會主義化」，「社會的調和化」，「加強經濟力量」，「強化軍力」，以及「擴大蘇聯在世界發展的影響力」。^⑤從蘇聯一九七七年憲法的序言部分看，蘇聯今天展現的面貌，似乎已「符合」了布里茲涅夫的條件。

從以上蘇聯領導人對不同社會階段的認知，以及每一階段表現的特點觀察，我們了解，「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爲了掩飾赫魯曉夫「革新」政策帶給蘇聯社會的災難，同時也爲布里茲涅夫的保守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最重要的是，爲蘇聯國家和蘇聯共黨的存在，創造新的合法性根據。試想，如果今天蘇聯已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進入共產主義建設時期，則蘇聯黨和國家不是很快就要走向「消亡」之路了嗎？

二、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全民國家」

^① Quoted in Wolfgang Leonhard,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Post-Khrushchev Era," in Alexander Dalin & Thomas B. Larson, *Soviet Politics since Khrushchev*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68), p. 56.

^② *Ibid.*, p. 57.

^③ *Ibid.*

^④ Quoted in Kux, *op. cit.*, p. 12.

從蘇聯的憲法看，這個共黨國家確實是無意消亡的。配合「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蘇聯國家被界定為：「社會主義全民國家，表達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全國所有民族和部族的勞工之意志和利益。」^①蘇聯國家的主要功能則是：「維持法律和秩序，維護社會利益以及公民的權利與自由。」^②

實際上，從憲法的觀點去解釋蘇聯的行為是缺乏意義的，因為，憲法在蘇聯除了發揮一般國家憲法的四項主要功能外，它還是一項對外宣傳文件。^③因此，我們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國家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扮演的角色。

在蘇聯政治學者眼中，「國家」一詞在政治上有兩種意義：在狹義方面，國家是政治體系的一個機構，屬於強制性組織的安排；在廣義方面，國家是所有社會的正式表達。如此，國家成為政治體系的同義字。蘇聯學者強調，傳統馬列主義是從上述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來研究國家的。馬列主義除了指明國家作為壓迫和統治的機器，作為強制工具等社會和階級角色外，國家也被視為一種公共權力，作為對立社會存在的不同形式，以及被視為一個特殊的組織體。^④

蘇聯共黨理論家顯然是從階級的觀點，對國家的概念從事辯證的解釋。當強調國家的壓迫和統治性時，它指的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這是共黨革命的對象。但當國家代表不同社會形式的表現時，它會隨著社會形式的發展而存在。換言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一直屬於「必要的存在」。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表現的樂觀看法，很快就面臨了實際的考驗，隨着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國家」受到外來強權的敵視，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失敗，以及簽訂「布列斯特——立脫夫斯克」(Brest-Litovsk) 條約引起的內部爭執，都使列寧必須重估他對國家的看法。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屆黨大會上，列寧針對「國家何時消亡？」的問題，告訴布哈寧(N. Bukharin) 說：「在我們談到我們的國家如何消亡之前，我們應準備召開兩次大會。目前離消亡時間還早。過早聲稱國家將要消亡，只是歪曲了歷史的前景。」^⑤

對於蘇聯國家歷史的發展，一些俄國史學者將它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由一九一七年到三十年代中葉（以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為界碑）；第二期是「由無產階級專政轉變到全民國家的階段」，由三十年代中葉到五〇年代

^① 一九七七年蘇聯憲法第一條，引自Lane, *op. cit.*, p. 534.

^② 憲法第四條。Ibid., p. 555.

^③ 除了宣傳外，憲法在蘇聯發揮的功能是：①它使現行社會秩序合法化，同時明白揭示其意識形態的原則；②它建立了政府和行政部門的架構；③它節制社會和機構的行為；④列寧蘇聯規範性的目標和期願。Asparumian, "The Soviet Union," in Macridis, *op. cit.*, p. 564.

^④ Burlatsky, *op. cit.*, p. 50.

^⑤ David Mc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1), p. 100.

末期（以二十二屆大會為界碑）；第三期則為「全民國家」階段，自六十年代開始進入本階段。^⑩

蘇聯理論家齊哈林（E. M. Chekharin）認為：「全民國家是從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國家發展而來。」此外，基於下列的情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發展為一個全民國家：

「(1) 在『成熟的』社會主義之下，蘇聯社會已開始在本身的基礎上發展，階級對立的情況已經消失。不再需要發揮鎮壓剝削階級的功能；

(2) 蘇聯所有階級和團體，所有民族和部族間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知識方面的團結，已經達成。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和共產主義觀念已普及到全國。由於工人階級在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工人階級的政治了解、組織，文化和技術水準的改進，工人階級的領導角色大為加強；

(3) 無產階級專政已順利完成了下列的建設工作；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農村的社會主義重建，文化革命，達成各民族之間的真正平等。」^⑪

從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全民國家的過程，國家未見消亡，只是國家職能的變更而已。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蘇共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即提出這個問題：

「常常有人問說：我們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在這個國家已沒有任何相互敵對的階級；沒有人從事鎮壓；因此不再需要國家；國家必須消亡……。現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告訴我們，在共產主義下沒有國家存在，那麼，我們為何不幫助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走向消亡？」^⑫

史達林的答案是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三種職能：第一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第二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第三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⑬史達林特別強調，傳統馬克思學說有關國家消亡的觀點，主要應用到許多國家同時建立社會主義的情況，而非應用到只有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情形。到了一九五〇年，史達林在另一篇文章中認為，蘇聯國家已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換言之，史達林強調的是加強國家的角色，而非促使國家消亡，因為，只要世界上還有資本主義存在，只要蘇聯還感受到被「包圍」的威脅，則國家就不會而且不應該消亡。^⑭

^⑩ 李邁先，俄國史（上）（臺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八月），頁八〇七。

^⑪ E. M. Chekharin, "The USSR-A Socialist State of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0), pp. 97-98.

^⑫ Stalin, *Leninism: Selected Writings*, pp. 468-469, quoted in Aspaturian, *op. cit.*, pp. 497-498.

^⑬ 尹慶羅編著，共黨理論批判（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頁一九一。

^⑭ Aspaturian, *op. cit.*, p. 498.

在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次大會中，赫魯曉夫對於蘇聯國家的性質和未來的前途，作了若干理論上的修正和補充。赫氏的觀點可歸納如下：

- (1) 無產階級專政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目前正逐漸轉變為一個全民國家……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 (2) 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消亡，但作為全體人民的一個組織？國家將存在到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為止；
 - (3) 當國家逐步走向沒落之時，國家的組織和機構，將逐漸轉變為公共自治政府的組織；
 - (4) 與此同時，政府各階層官員將在每次選舉時，有制度地輪流去職；至於扮演主要領導角色的官員，除非有特別天賦才能，否則不得在位三任；
 - (5) 蘇聯軍力將不斷加強，以履行保障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防衛和安全的國際任務。」⁽⁴⁾
- 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觀念，隨後納入一九七七年的憲法之中。如此，不僅國家不必消亡，連蘇聯共產黨也因為新修正的國家理論，而不必隨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轉換而消亡了！

參、蘇聯共產黨的角色

在蘇聯現行憲法中，蘇聯共黨被界定為「蘇聯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以及作為它的政治體系、所有國家與公共組織的核心」。蘇共的主要任務則是「決定蘇聯社會的總前景，內政與外交政策方向，指導蘇聯人民從事偉大的建設工作，以及為了共產主義的勝利鬪爭，賦予一個有計劃的、有系統的，以及具有理論根據的特質。」⁽⁵⁾

對於共黨在蘇聯扮演的重要角色，蘇聯學者認為有其必要性，因為共黨可以「發展蘇聯社會的政治上層結構，並且促進社會主義民主。」⁽⁶⁾但實際的情況是，蘇聯共黨在蘇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階段，它發揮了不同的功能。

一、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到「全民黨」

隨着十月革命的勝利，共黨很快地掌握了蘇聯的政治權力，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共黨逐漸成為一個集中化的組織，

⁽¹⁾ *Ibid.*, p. 500.

⁽²⁾ 蘇聯憲法第六條，引自Lane, *op. cit.*, p. 555.

⁽³⁾ P.A. Rodionov, "The Communist Party: Nucleu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oviet Society," in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op. cit.*, p. 77.

誠如托洛茨基所說：「由黨組織取代了黨本身；中央委員會則取代了組織；而最後，中委會則為獨裁者所取代。」⁴⁴透過此嚴密的組織，所有利益表達和利益集結的過程皆在它控制之下。其他專業性的社會階層非常小；政府部會的結構非常鬆散，只有共黨能夠控制所有的蘇聯社會團體。⁴⁵到了一九三〇年，黨的獨斷地位，似乎已全盤建立起來。

造成蘇聯此一從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黨專政的原因很多。瑪柯李（Mary McAuley）認為：黨要維持權力，因為它能掌握士兵的忠誠，以及對下層的自然活動作出反應。⁴⁶麥克列連（David McLellan）則提出下列三個因素加以解釋：共黨認為已經大權在握；官僚制度的擴張；工人缺乏有力的發言權。⁴⁷

在史達林統治時期，黨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史達林最初雖然利用共黨作為晉身之階，但以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名，史達林很快就訴諸恐怖和暴力，並將黨的角色打到幕後，而積極建立個人的獨裁。黨的功能染上了官僚的特性，根據羅斯陶（W. Rostow）的看法，共黨組織此時的主要工作是：

- (1) 負責監督指導其他官僚執行政策的情形，一直到地方的階層。黨在這方面扮演的就像是模範和領袖的角色；
- (2) 向政治局報告，提供領導階層其政策在各方面實施成功和失敗的意見，以及反映人民的心態、期望和挫折。
- (3) 從事政治宣傳，向民眾說明政府政策路線的道理何在。⁴⁸

即使從宣傳的角度看，畢亞勒教授指出，較低層的政治社會化工作，此時已由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擔任；較高層的則由官僚組織來訓練其成員，黨只是扮演對其黨員進行政治教育的角色而已。⁴⁹

史達林似乎只想運用共黨的歷史淵源，來使他的個人權威得到合理化。無論是政策的執行和制定，黨的功能大減，有時甚至不及秘密警察等組織。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即指出：「史達林後期的政治局成員，都是由政府組織的人員擔任。無論是來自政府和黨的政令，史達林本人都先以政府的代表身份簽字，然後再由共黨書記處的高級幕僚，以黨代表的身份簽字。」⁵⁰

⁴⁴ Quoted in Aspaturian, *op. cit.*, p. 494.

⁴⁵ Lane, *op. cit.*, p. 225.

⁴⁶ Mary McAuley,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 177.

⁴⁷ David McLellan, *op. cit.*, pp. 100-102.

⁴⁸ W. W. Rostow,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7), p. 55.

⁴⁹ Bialer, *op. cit.*, p. 15.

⁵⁰ Quoted in Lane, *op. cit.*, p. 225.

赫魯曉夫上臺以後，積極恢復黨在蘇聯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優勢地位，在一九五七年時，「黨主席團」的成員中，已有三分之二屬於黨官僚。赫某將秘密警察的權力削減很多。到了一九六一年，只有「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主席，在蘇共中央委員會中擁有投票權的資格。在政府的高級機構中，秘密警察的代表人數繼續下降。^④ 在同年蘇共二十二次大會通過的「新綱領」中，共產黨已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改稱為「全民黨」。

在一九七〇年代，布里茲涅夫繼續強化共黨的地位。例如，在一九七一年，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中，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來自政府部會；但有百分之四十五來自黨組織。此外，在一九五一年的蘇共政治局中，十一名成員有十名是政府官員，但到了一九七一年，十五名正式委員中，只有三名是部長會議的成員。^⑤

總之，蘇聯的黨政關係過去雖然有所變動，但討論蘇聯的實際政治過程時，不能忽略共黨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隨着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形式轉變為全民國家，共黨的角色也必須轉變。轉變為全民黨的結果，蘇聯學者認為：「共黨在社會中的角色比過去任何時期為大，它的轉換反映在黨的社會組成，以及黨工作的形式和方法上。」^⑥

二、共黨在「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功能

蘇聯學者們強調，共黨在「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角色日漸重要，主要基於下列的原因：

「當前有關『共產主義』建設的工作，範圍日漸廣大，而內容也更趨於複雜；必需動員學有專長的精英分子和羣衆，協助從事這些工作；必須將社會和經濟的預先計劃整合起來；必須透過有效的政治教育工作，培育『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在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時代，指導蘇聯的國際關係。」^⑦

有關現階段共黨的活動，蘇聯特別強調「政治領導」（political leadership）這個概念，顯示出共黨在蘇聯社會中擔負的獨斷支配角色，超過其他方面的社會力量。涉及「政治領導」，蘇聯學者認為，共黨集中注意於下列工作：

- (1) 發展一套具有科學基礎的政策，並從事實施政策的組織工作；
- (2) 幹部的拔擢和訓練；
- (3) 在顧及各行政部門的日增獨立性，以及增進羣衆創造力的情況下，決定行政管理的科學原則和方法；
- (4) 徹底的監督控制。」^⑧

^④ *Ibid.*, p. 226.

^⑤ Burlatsky, *op. cit.*, p. 111.

^⑥ Erik P. Hoffmann, "Changing Soviet Perspectives on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hen, *op. cit.*, p. 81.

^⑦ Burlatsky, *op. cit.*, p. 111.

末期（以二十二屆大會為界碑）；第三期則為「全民國家」階段，自六十年代開始進入本階段。^⑤

東亞季刊

四六

從上述蘇聯共黨的活動和任務範圍，我們借用下列若干西方的概念，分析蘇聯共黨在現階段蘇聯社會發揮的主要功能：

(1) 價值（意識形態）的形成

在政治科學中，意識形態是一個經常引起爭辯的名詞。依照蘇聯政治辭典所下的定義，意識形態是「政治、法律、科學、哲學、宗教、道德倫理、藝術（美術）等觀念的社會意識的總形式。由於社會中有階級的區劃，意識形態即帶有階級的特色，統治者則表現那支配經濟、政治與階級的意識形態。」^⑥

涉及蘇聯的意識形態內涵，布里辛斯基將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皆視為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包含下列五種成分：

1. 這種意識形態是以特定的假設為基礎。換言之，它形式上是一種明確的陳述，可以作為啟發、指導和思想灌輸等目的的參考；
2. 由於意識形態的部分可以作為政治領袖、他們的行動，以及羣衆之間的聯繫，故其陳述不應過於複雜，至少屬於文字學說的部分，應以相當簡單教條的形式來表現，並將其中部分「神話」和純理性部分結合起來；
3. 意識形態試圖以特殊階級、國家或種族為對象，譴責現存事務之不當所在。如此，那些羣衆感到不滿的性質，即可具體地被展示出來；
4. 它是行動的指南，提供改變現狀、毀滅敵人及滿足羣衆期望的特殊方法；
5. 雖然意識形態在有關特殊、具體及制度範圍方面，沒有準確的表達形式，但它對未來社會的性質，已給與一般性地界定。此即，在未來社會中，現存的不滿情況將會消失。而透過此意識形態塑造的最後理想國，將屬一個神話及充滿希望的國家，可以滿足大多數個人的期望與需求。^⑦

由於蘇聯強調階級成分，因此「反映」無產階級利益的馬列主義，自然被視為唯一合法的官定意識形態。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意識形態不僅是一種靜態的理念陳述，還代表觀念與行動的結合，所以除了馬列主義外，它還包括蘇聯領袖與共黨特殊機構的角色，以及蘇聯重要文件等所蘊涵的意識。

從蘇聯意識形態包含的成分，我們了解它在蘇聯國內發揮了下列重要的功能：

- 第一、它具有解釋（interpretive）的功能，解釋各種現象，並幫助黨政官僚人員瞭解各種事件的因果關係；
- 第二、預測的（predictive）功能：預測未來事務的可能發展，幫助計劃的擬定，並對各種後果，預作準備；

^⑤ I. V. Lekhin and M. E. Strave, eds., *Kratkij Politicheskij Slovarj*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69), p. 117.

^⑥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86-487.

第三、規範的 (prescriptive) 功能：提供民衆與執政者未來行動方向的參考；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

第四、合法的 (legitimate) 功能：提供政府各種政策，以及各種政治行為的合理化基礎；

第五、凝聚性 (cohesive) 功能：提供共同的政治語言，政治社會化的內容，以及社會整合的工具。在蘇聯的政治發展過程中，上述各項功能，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例如，在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蘇聯的意識形態充分發揮了解釋的功能；在現階段，合法性的功能最為重要；至於預測的功能，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故已失去該項價值。

無論如何，蘇聯共黨在形成蘇聯意識方面，是扮演獨占角色的，共黨早已認清，意識形態是防衛它們既得利益以及迫使民衆順從的工具；意識形態也是它們權力的主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共黨是不容許其他意識存在的，也不容許它們解釋現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權力受到其他社會力量的挑戰。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配合環境的需要，蘇聯官定的馬列意識形態，長久以來已在蘇聯經過不同的解釋而有了新的內涵。明顯的例子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已從向現狀挑戰變成現狀的維護者。意識形態的內容也必須反應蘇聯社會的現代技術工業結構以及因應而生的其他團體的存在。換句話說，共黨理論家目前不但要應付黨政精英，同時也要應付其他機構團體的問題。^⑤

蘇聯共黨在建構新的政治價值方面，似乎能夠維持其權威的地位。史達林死後，蘇聯社會會再度出現一種所謂的「工會意識」 (trade-union consciousness)，但並未受到排斥。列寧過去即曾了解到，在發展體系變革的需求上，這種工會意識誠屬一大阻礙；而現在出現的此一意識，不但不會發動革命，更會致力於保護一個龐大的國家。因此，只要透過一個控制和限制下的促進功夫，此工會意識有利於蘇聯的政治穩定。^⑥因為，工會意識只想在現狀下尋求利益，並非要打破現狀。

另外，蘇聯內部目前也出現若干不滿政府的態度，但這些不滿人士數量很少，在羣衆中不起太大作用。因此，不滿人士尚未能對蘇聯政權的「合法性」形成挑戰。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士了解，在史達林死後的蘇聯政治舞臺，他們不會無故遭到逮捕；他們也知道什麼程度的「不滿」行為才會使共黨當局可以忍受。因此，蘇聯不滿人士仍未能形成對共黨意識形態具有威脅的另一價值體系。

(2) 利益的表達和匯集

在一般多元社會，將各種利益表達予決策者作為制定政策參考的功能，大都是透過利益團體和大眾傳播媒介來實施。但在蘇

⑤ Lane, *op. cit.*, p. 219.

⑥ Walter D. Connor, "Mass Expectations and Regime Performance," in Seweryn Bialer, ed.,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57-158.

聯，共黨組織則扮演獨占性的角色。主要原因是其他利益表達的工具，皆控制在共黨組織手中。

以報紙為例，蘇聯學者認為這是「表達輿論和形成共產主義社會傳統」的有效工具。但是報紙却控制在共黨以及共黨附屬機構的手中，更重要的是，共黨強調：由於蘇聯社會對於基本問題沒有分歧之見，因此有關報紙討論的各項問題，帶有「業務性」的特質，缺乏激烈爭執。換言之，在蘇聯報紙上，不會出現不同利益的表達。此外，蘇聯報紙也不得提供「違反國家安全的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報紙不但無法反映民意，並且也不能提供蘇聯共黨允許範圍外的訊息。^{⑤0}

在蘇聯，類似工會、「共青團」（Komsomol）以及其他專業性的社會組織，其參與的人數雖然年年增多，^{⑤1}但扮演的却是蘇共在國內的外圍組織角色，這些組織的領導者皆為共黨，其活動也受到共黨的支配。我們很少看到像作家、教育者、運動員等組織，有其特殊的意見和觀點出現。

當然，隨着蘇聯經濟的發展，蘇聯社會也會出現一些功能性的特殊壓力團體，這些團體（如果勉強稱之為團體）或許也會為其特定利益而活動。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團體並未制度化，他們的意見也未進入決策過程。由於共黨組織的強大反對壓力，這些團體不是被迫就範、分裂，就是被共黨組織個個擊破。其成員有的為共黨建制所吸收，很快被社會化而改採保守的立場。

為西方學者所重視的蘇聯官僚團體，像「國安會」、「經濟部門」和「軍方」等，也很難為其官僚機構，表達特定的利益而直接到達決策過程，除非經由黨組織的管道進行。共黨對於代表某些特定地區和機構的利益表達非常敏感，將它們指為「無政府主義的」（anarchic）和「官僚主義的」（bureaucratic）傾向，「有害於社會的進步活動」。^{⑤2}所謂「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乃是一些地區組織的低層人員，由於地方性和民族主義的心理，企圖以地方利益來對抗國家利益。蘇共認為，由於蘇共是「社會主義社會所有民族和階級利益的代表」，故能對抗這些「離心傾向」；至於「官僚主義」的現象，蘇共認為它企圖「束縛人民羣衆的創新力，導致民衆和官員之間的鴻溝」。同時，由於官僚主義者輕視民衆的需求，故無法在羣衆中建立信心。^{⑤3}

如此，共黨機構成為蘇聯利益表達的唯一場合。西方學者的研究顯示，在赫魯曉夫進行教育改革之前，蘇共第二十次大會即提供有關團體表達意見的機會；而蘇共中央委員會因為容納來自黨政和其他附屬團體的領袖，故不同的消息也在此表達，作為決策的參考。^{⑤4}

⑤0 Burlatsky, *op. cit.*, pp. 121-122.

⑤1 例如，蘇聯人口從一九四九年的二千八百五十萬人，增到一九七六年的一億人；參加共青團的人數也從一九三六年的四百萬到一九七六年的三千五百萬人。*Ibid.*, p. 120.

⑤2 *Ibid.*, p. 114.

⑤3 *Ibid.*

⑤4 Lane, *op. cit.*, p. 212.

在蘇聯，利益匯集的工作是由較高層的黨機構擔任，包括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書記處」。但最重要的匯集過程，可能是在「政治局」進行，這是蘇聯的統治團體。至於其他官僚結構，它們的主要功能不過是提供建議維持整個體系的存在而已。日前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綜合各種意見的過程中，是否產生爭論？如何形成妥協？誠然，現代化過程，特別是科技的發展

在蘇聯，利益滙集的工作是由較高層的黨機構擔任，包括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書記處」。但最重要的滙集過程，可能是在「政治局」進行，這是蘇聯的統治團體。至於其他官僚結構，它們的主要功能不過是提供建議維持整個體系的存在而已。

目前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綜合各種意見的過程中，是否產生爭論？如何形成妥協？誠然，現代化過程，特別是科技的發展，已造成蘇聯社會的複雜。衝突不可避免，而衝突往往也是導致任何社會政治變遷的主要原因。但在蘇聯，衝突往往只發生在下層結構。誠如一名西方學者所說，在蘇聯，「我們不應談論統治團體和軍方領袖，以及和工業計劃者之間討價還價，或是彼此競爭這種問題。因為，高級軍方書記官員，或是工業計劃者相互間的討價還價，是在統治團體內發生的。」⁽⁵⁾

史達林死後，我們發現蘇聯的決策，表現出相當共識的氣氛。我們缺乏第一手資料證明，妥協的結果如何產生，但下列兩項原則，可以提供觀察的線索：

1. 所有國家權力機構，包括大部分行政和管理機構，以及法庭在內，均按選舉產生；
 2. 下級國家的機關，要向上級機關負責和報告；
 3. 上級機關有指導下級機關的義務；
 4. 所有國家機關、官員和民意代表的行動，應受到工人的控制；選民有權對那些有負人民信託的代表，實施罷免行動；
 5. 下級國家機關公布的法令應完全符合上級機關的法令；
 6. 在權限之內，以及有效表現和運用當地資源和潛力的情況下，予地方機關更多創新的餘地；
 7. 運用雙重附屬制度，特別針對行政和管理機關的工作為然，使地方和國家利益，協調一致。⁽⁶⁾
- 「民主集中主義」在此表現的是集中，而非民主的特質。任何不合官定立場的意見，很容易因此而排斥出局。
- 其次，雖然史達林死後的領導政治，已趨向集體領導的形式。但誠如畢亞勒教授所說，由於「蘇聯行政制度的集中化，缺乏制度的安排規定高級官員的任期和去職辦法，下層精英控制上層人員的合法性管道相當脆弱，加上蘇聯的決策和政治過程皆在秘密下進行，非局外者所能影響等，使得高級領導階層出現個人權力集中化的傾向。」⁽⁷⁾因此，總書記在決策時，仍能發揮其「王中之王」(first among equals) 的影響力。

(2) McAuley, *op. cit.*, p. 311.

(3) A. Denisov and M. Kirichenko, "The System of Soviet State Organs," in Randolph L. Braham, *Sovie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 312.

(4)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op. cit.*, pp. 70-71.

(3) 政策的施行和社會控制

共黨在實施政策的施行功能方面，主要透過兩項途徑：一是意識形態的壟斷，另外則是人事或幹部的控制。有關前者，我們已在本文論及；至於後者，蘇聯強調，有關幹部的選擇、安置和訓練，一方面考慮到運用老幹部的經驗和知識，另一方面則培養年青而有前途的新幹部。在蘇聯心目中的年青才俊，應是「高水平的政治意識加上優秀的專業訓練，有充分的知識足以決定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問題，以及了解現代管理方法。」^⑩

為了維持共黨對人事選擇的控制，蘇聯發明了一套「幹部候選人名冊」(nomenklatura) 的辦法，這是列寧主義政黨制度的一個特色。它代表的是一個人員和職位的清單，某一個特定的黨機構有權予以監督。換言之，共黨可以控制集體農場主管、工廠負責人、工會書記、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等人士的任命。當然，並非每一工作皆需受到黨的監督，候選人的資料存放中央或地方也不一定，這都要看職位的重要與否來決定。但無論如何，這個辦法維持了黨的「任官」權力，並且運用起來相當彈性。^⑪

從「社會主義法制」的觀念，蘇聯認為各級機構政策的實施，應向代表民意的各級「蘇維埃」負責。但實際上，共黨却經由各種途徑控制「蘇維埃」。以蘇共和「最高蘇維埃」(Supreme Soviet) 的關係而言，整個選舉活動即受到共黨操縱的「選舉委員會」(electoral commissions) 的影響。這個委員會是由黨和共青團、工會等代表組成，他們負責所有選舉安排和計票工作。^⑫

共黨也控制蘇維埃代表候選人的提名。一般而言，提名非以個人為基礎，而是透過那些和共黨具有密切關係的組織推舉。有資格的候選人必須忠於共黨統治，例如在一九七九年的「最高蘇維埃」代表之中，有三十名「蘇聯英雄」，二百八十八名「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一百七十四名「列寧和國家獎章」得主。^⑬由此可見，提名本身代表的就是政治酬庸，如果提名當選後不再受到共黨領袖信任，則很快就舉行罷免他的會議，不多時，這個代表就失去其政治前途了。^⑭

實際上，無論「最高蘇維埃」的選舉結果如何，這個所謂代表民意的機構，一直都在共黨控制之下，黨官員佔有所有的高層職位，而包括「最高蘇維埃」主席在內以及半數以上的常設委員會主席，皆屬蘇共中央委員會成員。

⑩ Burlatsky, *op. cit.*, p. 113.

⑪ Rothman and Breslauer, *op. cit.*, pp. 172-173.

⑫ Peter Vanneman, *The Supreme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03. See also M. A. Krutogolov, *Talks on Soviet Democrac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0), p. 94.

⑬ Krutogolov, *op. cit.*, p. 103.

⑭ John S. Reshetar, Jr., *The Soviet Polit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 184.

肆、共黨與現代蘇聯社會問題

布里茲涅夫對「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所持的保守觀念，為蘇聯社會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軍事國家，但却留下了一大堆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一九八三年一月到三月期間，「美國新聞總署」曾邀請美國國內著名蘇聯問題專家，召開了一項定名為「一九八〇年代的蘇聯」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列舉了今天蘇聯面臨的社會問題為下列幾項：

- (1)生活水準的停滯不前：雖然蘇聯的個人消費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是穩定地增加，但除非目前蘇聯的生產量急遽增高，或者整個投資優先秩序改變，否則個人消費量不會提升。生活水準的停滯，成為政治穩定的威脅，後果堪慮。
 - (2)社會向上層流動機會的減少：享有名利特權的精英分子，有世代相傳的傾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普遍減少，而受高等教育者大多來自權貴之家，如此造成年青人的道德敗壞和嚴重的勞工變動問題。
 - (3)人口趨勢不利：幼兒死亡率在一九七一年後逐漸上升；二十到四十四歲的男性死亡率也增高，目前平均壽命只有六十二歲，為工業國家所罕見。出生率降低，造成勞力和兵員供應不足的問題。中亞回教民族人口成長速度超過其他地區；俄羅斯人到本世紀末有低於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勞動力的分布也不平均。
 - (4)酗酒嚴重：過去二十五年，蘇聯人民個人的飲酒消耗量，平均每年上升百分之四點五。酒精中毒成為俄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連帶產生交通事故、自殺和其他犯罪問題。
 - (5)公民士氣低落：蘇聯民眾對於未來不存樂觀態度，認為意識形態無關緊要，並對宗教和民族傳統，重新感到興趣。社會紀律的腐蝕，特別表現在普遍的腐化現象。
 - (6)民族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困難，諸如蘇聯聯邦制度的性質；地區的經濟發展；幹部政策以及文化等。^③
- 安德洛波夫(Y. V. Andropov)繼任總書記後，似乎認清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安某首先要求對過去二十年的變化，作「深入的理論分析」，以及對現行情勢，作「實際的分析」，安德洛波夫承認：「我們尚未對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社會作適當地研究，也沒有完全揭示出那些支配社會發展的法則，特別是經濟方面。」^④

^③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 A Conference Report," Prepared by P/RSE Staff, Office of Research,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June 1983, pp. 3-4.

^④ Quoted in Kux, *op. cit.*, p. 12.

對於安某而言，這是屬於理論和實際的問題。此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已無法解決它和現實社會存在的矛盾。而帶有辯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矛盾的無法解決，又都歸咎於馬列理論塑造下的共黨制度。

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在繼承安德洛波夫發表的第一次演說中，即強調他將貫徹前任的政策路線。換言之，他將改進政府組織的工作，改善黨領導的作風，動員勞工的積極性，以及繼續強調秩序和紀律。^⑤

契爾年科和安德洛波夫兩個人的年齡和健康狀況，都沒有辦法證明，他們的改革是否能夠見效。目前，蘇聯新的領導人已經產生，戈巴契夫（M. Gorbachev）擁有年輕的本錢，農經專家的頭銜，以及強烈的改革慾望。但是，他面臨的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因為共黨在目前蘇聯社會的角色而引起。

例如，民眾的無力感，對政治的疏離現象，主要因為缺乏表達意見影響決策的管道；同時，人們的創造力也未能獲得適當的發揮。於是正常有益的經濟企業精神，被迫從藏污納垢的「第二經濟」（second economy）中找尋出路；關心公共事務者，則從事公開或秘密的不滿活動。這些帶有動力和創造力的力量，如善加利用可以強化政權。但在共產黨制度下，却被迫走進「犯罪」管道，成為破壞政權的力量。^⑥戈巴契夫政府面對的問題是，共黨是否願意犧牲若干權威，把社會帶入一種夥伴關係，將民眾的創造力和統治精英的利益結合起來？

其次，今天蘇聯的經濟困境，主要來自生產不足，而生產不足，則歸咎於經濟決策過度集中於共黨組織，以及無法提供工農足夠的生產誘因，增進其勞動的積極性。^⑦對於上述弱點，蘇聯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即討論到改革的問題。關鍵之處在於放棄中央計劃經濟，則有損於計劃執行部門的既得權益，造成權力分散，和現行蘇聯制度不合；如果不放棄的話，任何農業和工業的改革，皆屬無效。另外，刺激改革，則必須提供更多財政或物質誘因；但共黨又擔心如此會鼓勵個人資本主義的傾向，破壞蘇維埃社會規範，造成「精神污染」。

共黨制度形成的矛盾還不止於此。共黨這些年來，在蘇聯已形成一個自私自利的特權階級，貪污腐化的情形非常嚴重。但就像哥德曼（Marshall Goldman）教授所說，在蘇聯中央計劃制度下，清除腐化可能將「好的腐化」和「壞的腐化」一併清除。哥德曼認為，蘇聯的制度必須有所「取捨」，沒有適度的「腐化」，則無彈性可言。換言之，在國家計劃下，適度腐化的利益可能超過付出的代價。^⑧哥德曼言下之意，可能指的是蘇聯的「第二經濟」。這是蘇聯統制經濟下的副產品，它的存在，對於蘇聯

^⑤ Soviet World Outlook, Vol. 9, No. 2, February 15, 1984, p. 3.

^⑥ Richard Pipes, "Can The Soviet Union Reform?"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4, p. 57.

^⑦ Ibid., p. 50.

^⑧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1983, p. C5.

的經濟活動，仍有一些積極的意義。^②

第三是有關法制改革的問題。蘇聯學者雖一再標榜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法制，視為黨政官僚行動的準繩，但誠如瓦尼曼（Peter Vanneman）教授所言，「俄國的法律傳統是在一個特殊的、無機組織的形態下發展的，它一向屬於行政機構的附屬品。俄國的法律並非源自於大眾的同意，也不是出自習慣的演進，而是屬於沙皇的欽命。」^③

這一俄國傳統法律精神，由於蘇聯共黨之意圖控制所有社會層面，而被善加利用了。所謂「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下的民主，被染上了階級的色彩。共黨理論家表示：

「蘇聯憲法的特質，乃是反映這個國家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其中包含社會的階級構造，現行階級的真正地位，以及這些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在不同行動領域中民主的程度和形式。」^④

由於共黨官僚的拒絕妥協，公民自然無法參與法律的制訂，但他至少應獲保證，這些成文法律必須對所有人民具約束力，包括政府權威在內。一個具正常功能的社會，其必要條件是其公民了解那些能做，那些不能作。要達到這點，至少應有嚴格司法控制黨官僚的設施，即中止來自沙皇專制政府，所謂政府工作者超乎法律之上的傳統。^⑤對戈巴契夫而言，這樣的改革當然有其困難，但拒絕改革，則民衆的冷漠，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仍會持續。

最後是涉及黨官僚和技術官僚的利益衝突問題。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這個現象就已存在。它反映出，在科技革命的今天，蘇聯社會需要大批學有專長的人才，而共黨又無法滿足其利益需求。在擔心本身權益受損的情況下，黨官僚往往對新知採排斥態度，最後形成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蘇聯領導人目前之所以呼籲改進黨員作風，摒棄「形式主義」，着眼即在於此，問題是，黨官僚的觀念能否配合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速率，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危機。

五、結論

漢特（R. N. Carew Hunt）在其「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的前言部分，即曾警告他的讀者說：「我們很容易忘却我

① 格雷戈里·高斯曼（Gregory Grossman），「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7, pp. 37-40.

② Venneman, *op. cit.*, p. 22.

③ Denisov and Kirichenko, "Soviet Constitutionalism," in Braham *op. cit.*, p. 256.
④ Pipes, *op. cit.*, pp. 57-58.

們制度背後存在的理論，但共黨却從不忘記他們自己的理論原則。」⁸³ 共產黨人誠然重視理論，但馬克思生前就覺悟出他所建構的這套充滿空想色彩的理論，會因經不住實踐的驗證，而有遭到分屍的可能。因此，他才會在晚年如此寫道：「我所確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⁸⁴ 馬克思這方面的預言究竟沒有錯，他的追隨者在他死後，很巧妙地把他建構的「烏托邦社會」和實際權力政治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看，蘇聯國家和共黨是不會自行消亡的，因為「擁有權力者是不會自動放棄權力的」。同時，為了使國家和共黨的存在得到合理化的來源，我們也預期在「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之外，可能會有新的理論性名詞，在蘇聯出現，它仍舊是一個過渡到共產主義之前的階段。蘇聯共黨、蘇聯國家，似乎對於馬克思、列寧塑造的「理想天國」沒有興趣，除非那裏也有一個讓它們施展權力的赤色園地。

其次，單純的運用一個模式，或是研究途徑來解釋蘇聯的現象，可能造成瞎子摸象的結果。本文的研究顯示，沙爾列特（Robert S. Sharlet）所提共黨政治體系的特點，值得吾人參考：

- (1) 一個共黨政治體系是存在於相當封閉的社會之內，此社會常常難為西方社會科學家所能接近；
- (2) 共黨體系缺乏自主的次級體系；
- (3) 主要政治資源，意即戰略政治地位，是集中在少數精英階層手中，他們對決策過程，享絕對特權；
- (4) 其決策過程，無法直接觀察，也非可靠調查方法所能觸及；
- (5) 共黨體系的結構、功能和角色，有相當「非異殊化」的趨向；
- (6) 一個共黨政治體系和其社會體系之間的邊界，十分微弱，甚至不存在。⁸⁵

儘管史達林死後，蘇聯政治發展各有其持續和變遷的一面，但極權主義模式似乎較能提供我們一個簡單但却廣泛地理解，因爲它觸及共黨制度特殊的那些面相。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蘇聯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確實帶給共黨一些新的問題，而其中屬於社會性的，多於政治性的。從某種程度看，它代表共黨制度處理政治問題比處理社會問題容易。前者可以透過專斷權力加以解決，後者則必須面對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但是，如果沙爾列特所說的不錯，即在政治和社會體系含糊不清時，蘇聯仍會不斷以政治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如此，蘇共的角色和功能，不會因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受到太大的影響。誠如蘇聯理論家說的「其階級性質、其基本組織原則和意識形態基礎，都不會改變。」⁸⁶

⁸³ R. N. Carew 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2), foreword, V.

⁸⁴ 同上張明貴譯 (Reo M. Christensen 等著)，意識型與現代政治，《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新亞·桂冠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一六五。

⁸⁵ Robert S. Sharlet, "Systematic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ystems," in Armstrong, Symposium, *op. cit.*, pp. 22-23.

⁸⁶ Robert S. Sharlet, "Systematic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ystems," in Armstrong, Symposium, *op. cit.*, pp. 82-83.